

容闳与中美文化的沟通

李喜所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在容闳 1872 年带领幼童赴美留学之前, 中美两国的仁人志士曾作过各种努力企图打通中美文化交流的通道, 但成效不多。而容闳开创的留学事业, 不仅使中美之间达到了真正意义的文化沟通, 而且提升了文化交流的层次。容闳之所以能承担如此重任, 是和他中美文化兼通、富于理想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分不开的。

[关键词] 容闳; 中美文化; 沟通

[作者简介] 李喜所(1946—), 男, 河北省涉县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留学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71(2005)01-0176-05 [收稿日期] 2004-11-20

中国和美国虽然是太平洋两岸遥遥相望的大国, 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沟通却晚至 19 世纪 70 年代。拨动这一文化交流航船的巨人, 应该是留美先行者容闳博士。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视容闳为中国留学教育的奠基人, 笔者也曾在 1990 年出版的一本容闳的传记中首次称其为“中国留学生之父”^[1]。这无疑反映了容闳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核心价值。但如果从中美文化相互隔膜、有限接触到逐步沟通的曲折的历史进程去观察, 容闳同样是一位筚路蓝缕的开拓者, 具有奠基意义。这可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容闳特有的文化魅力和其文化行为的特殊效果得到有理有据的说明。

一、相互隔膜的中美文化呼唤破冰的先行者

1847 年, 十九岁的容闳赴美留学时, 中美两国还处于雾中看花、瞎子摸象的极不了解的状态。

美国人何时知道世界上有个中国, 到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 可以肯定, 在美国抗英独立之前, 中美没有任何直接往来。当时的中国茶叶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至伦敦再转运美洲; 美国的人参等土特产也是通过这种途径输入中国的。美国独立后, 为发展经济和对抗英国, 企求与中国贸易往来。但美国人关于中国的情况多是从一些旅行者及东印度公司的商人那里零星得到的, 对中国存在着无知和偏见。他们认为, 中国人是“长尾巴的天朝人”、“雨伞民族”、“未开化的‘猪眼’人民”, 可笑又不可救药。这无疑阻碍了美国人的来华步伐^[2](P86)]。

然而, 美国人冒险精神很强。在 1774 年中美贸易正式往来之前, 极个别的商人、游客、海盗曾来华探险。据可靠史料记载, 至少黎亚德(John Ledyard)和戈尔(John Gore)到过中国。黎亚德是美国康州人, 大学毕业后随英人在世界各地探险, 漫游过广州。返美后, 讲述在华的所见所闻, 引发了许多美国人的好奇心。特别是那些商人巨子, 试图来中国发横财。于是, 1774 年 2 月 22 日, “中国女皇号”轮船自纽约起航赴华, 次年 5 月 12 日返回纽约。此次航行, 大出美国人所料, 竟获纯利近四万美元, 利润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美国新闻界争相报道, 该远航的报告也转到了美国国会。其中讲道: “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 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尚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之间的差别, 视我们为‘新人’。当我们将美国地图示之, 并告以疆域、人口的情形后, 他们对今后土产出口可能大量增加一事, 感觉十分高兴。”^[3](P5)]可见, 美国人对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的美国议员还专门给总统写信, 建议重视和拓展对华贸易。美国国会于 1789—1791 年曾立法保护对华经济贸易。

中美贸易虽然打通, 但美国还没有一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书刊, 美国对中国文化依然茫然。1818 年, 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杰弗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并表示特别想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未能如愿。1825 年, 十三岁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来到中国。他先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攻读中文, 后从事商业活动,

能讲汉语和用中文写作。这是真正懂汉语的第一位美国人,可惜没有留下什么著作。1834年,一位美国商人出于好奇,从广东买了一位小脚妇女运至美国,美国人争看“三寸金莲”。这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也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习俗的无知。直到1838年,美国的哲学学会会长杜彭书(Peter S. Du ponceau)经过努力,才出版了《中国文字之性质及其特征》一书。但他根本不能阅读中文图书,资料皆来源于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报告和谈话,水平可以想见。比较有一定水平来介绍中国文化的还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

182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启程来华,途中遇到了亨特,亨特成了他的中文启蒙老师。这为裨治文的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他到广州后,一面行医,一面办起了英文书刊《中国丛报》,介绍中国的文化典籍和人情事故,还翻译了一些中国私塾的教科书,这成了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1841年,他出版了《中国广东话注解文选》,长达七百二十八页,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相互注解,简明易懂,对沟通英语言文字有开拓之功。1842年,在裨治文的努力下,成立了美国东方协会,以研究东方为宗旨。后来,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分会成立,裨治文也参与其中,贡献尤多。鸦片战争时期,裨治文是美国人来中国探险的重要人物,他出版的《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是美国人关于广州情况的最早著作之一。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较裨治文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1833年来华,在美国公理会创办的印刷所当工人,学会了中文和日文,留心收集有关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资料;1844年出版了《中国地志》,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的地理分布和特点;1848年又出版了《中国总论》,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民情、风俗、人口、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等都有概括的介绍,还附有“中华帝国地图”,这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还曾返回美国作过多次演讲,形象而生动地介绍中国的民情风貌和古典文化。他撰著的《中国缀音字典》,收汉字一万两千多个,对中英文的相互变换大有裨益。晚年,卫三畏被耶鲁大学聘为中文教授,成为在美国讲授中文课程的第一人。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前后数十年间,美国人虽然对中国文化有所涉猎,但仍是皮毛,不识庐山真面目。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也大体如此。

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人最早关于美国的记载是谢清高的《海录》。谢清高是广东嘉应州(治今梅州市)人,自1782年起,十八岁的谢清高就随外国船只飘洋过海,后因双目失明,返归广东。1820年,杨炳南在澳门偶遇谢清高,据谢清高的口述整

理成《海录》一书,涉及了世界几十个国家。书中把今天的南洋群岛称为“南海”,把印度和印度支那半岛称“西北海”,将欧洲、美洲、非洲叫“西南海”,把美国叫“竿里干国”,其云:

竿里干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里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其国出入多用火船,内外具用轮辅,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自行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亦多效之矣。自小西洋至竿里干,统谓之大西洋,多尚奇技淫巧,以海舶贸易为生。自王至于庶人,无二妻者。山多奇禽怪兽,莫知其名^{[4](卷2)}。

这些记述大体是准确的,至少向人们展示了三方面:第一,美国的地理位置;第二,使用蒸汽机轮船的情况;第三,一些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书中称美国是“竿里干”,被当时许多人所接受。那时人们一般称美国为“竿里干”、“米利干”、“米利坚”、“花旗”、“亚墨里驾花旗”等,其中“竿里干”最流行。

19世纪30年代,关于美国的记述有所增加,不下十余种。虽多简略,但反映了中美在逐步接近的趋势。叶钟进在1834年所写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中讲到美国时较谢清高要深入多了。其中称:“美利坚即中国所称花旗者。沃野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其人重行宜,无梗化,无催科,有军事,方治赋。……美夷常指英夷为山狗性。”^{[4](卷2)}。可见,早期中国人对美国有良好的印象,对英国则很不以为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许多爱国者从救亡的目的出发去了解西方,对美国的认识也在深入。1842年,林则徐组织编辑了《四洲志》,其中关于美国的部分有两万多言,甚至讲到了美国的议会制,认为美国凡“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须由议会决定“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而且有惯例,总统“四年为一任,期满变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5](第11页)}。魏源的不朽名著《海国图志》,也用相当多的篇幅去介绍美国,并附有草图。在魏源眼里,美国一是富,“每年物产及制造货件,共银一亿一千万两,可观其国丰盛矣”;二是强,“其水师武备甚善,屡与英国交锋获胜”;三是公,“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4](卷2,60,61)}。较《海国图志》稍后出版的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对美国的介绍进一步丰富,尤其对华盛顿大加颂扬: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厝位号,不传子孙,而创办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赅赅乎三代之遗志。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伟绝伦。呜呼,可不谓人主矣哉^{[6](卷9)}!

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知之甚少的那个年代里,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的这些介绍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但是,他们一不懂外语,二无法出国,他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外人办的一些报刊杂志、传教士的口述以及少量的图书,其中半是传闻、半是臆测,科学性是谈不上的。但这也是中国人认识世界必经的一步。不过,鸦片战争时期也有极个别人由于偶然机会,踏上了新大陆,留下记述的仅有林针的《西海纪游草》。林是福建厦门人,家境贫寒,较早学会了英语,在洋行充翻译。1847年受聘赴美工作,1949年返国。他在美国既和达官贵人有来往,也和一般平民交朋友,广泛接触了美国社会。所以,《西海纪游草》中的记述形象生动而具生活气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然而,由于作者文化水准较低,眼光也欠敏锐,全书的层次不高,所以不可能在沟通中美文化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综而观之,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几十年中,中美少数仁人志士曾千方百计相互介绍过美国和中国的一些情况,但基本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对多数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连完整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形成。中美文化仍停留在相互隔膜的状态。时人评论清廷的“许多大吏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7](第2册, P412)}。中美在1844年已经签订了《望厦条约》,但道光皇帝还怀疑世界上还有个美国存在,让大臣去查一下“是否确实”^{[8](P221)}。这种无知状态,有碍于中国人走向世界和向西方学习,也不利于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所以,沟通中美文化是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感的一个大问题,呼唤有能力、有水平的重要人物来承担。

二、容闳特殊的文化魅力为其承担沟通中美文化的历史重任提供了可能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仅仅识时务还不够,还得有完成“时务”的素养和能力,才可成为俊杰。前面所述那些为沟通中美文化而孜孜以求的先驱者,不可谓不识时务,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沟通中美文化的俊杰,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方面的学养及才能。就当时的实际状况来讲,如果让中美文化关系发生质的飞跃,此人必须对美国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并有一定的中国文化底蕴,同时有献身中美

文化沟通的理想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而这三条,容闳得天独厚,无人可比。

容闳所受的启蒙教育是在传教士于澳门创办的教会小学完成的,这就使容闳不仅有很好的英文底子,而且了解西方一些基础文化知识。1840年,他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后,学业有不少长进。后来,马礼逊学校迁至香港,香港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马礼逊学校严格的西方式的教育,使容闳与西方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1847年,容闳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国留学时,已经可以用英文写流利的文章了,一些习作曾刊登在《中国丛报》上;他也因此对英国文学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从小学到大学,英语成绩都是最好的。这为他钻研美国和西方文化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十九岁的容闳到美国留学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大学,而是先入马萨诸塞州很有名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读中学,又受了两年多非常规范的中等教育。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文学系攻读西方文学,但数理化同样要学习。大概是由于他对数学兴趣不浓的缘故,数学常常要补考。可见,容闳的志向还是在人文方面,不大想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当1854年他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时候,可以讲他不仅受到了系统的美国式的西方教育,而且对美国及西方文化有系统而深入的了解。在鸦片战争前后乃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像容闳这样了解美国的中国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前面提到的谢清高、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叶钟进等由于情况特殊,无法相比,就是六七十年代被人们公认的西学知识丰富的名家也相形见绌。例如,和容闳同生于1828年的王韬,1849年才往上海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印书,开始接触西学;后因上书太平天国遭清廷追捕逃往香港,帮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对西方文化有更多的了解;1867年开始了他对欧洲的三年游历考察,收获颇丰;但和容闳的西学素养和文化结构差之甚远。西学名家何启在英国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但那是19世纪70年代末的事,何况何启1859年出生的时候,容闳已经从耶鲁大学毕业五年了,根本不属同一代的人。总之,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容闳是真正了解美国和西方的第一人,这为其承担沟通中美文化的重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容闳的中国文化素养,肯定和魏源、王韬等硕学鸿儒不是一个等级;但也不是一窍不通,或者说水平很低,而是有相当的基础。他出国留学时已经十九岁,对中国社会文化是基本了解的,而且按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讲,曾学过四年中文,在马礼逊学校上学同样设有中文课程。应该讲,他赴美时已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容闳深感没有中文书可读的苦恼,千方百计托人从国内带书来,并挤时间

刻苦攻读,虽然增加了负担,但不至于使中文水平下降。到1854年容闳大学毕业时,他与同学临别赠言,用的皆是中国的名言佳句,例如“礼之用,和为贵”;“有志者,事竟成”;“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等^[9]。他还会写诗,其中一首云:“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一日霜雪降,自见青松不见花。”^{[1](手迹之插图)}此诗虽难称上品佳作,但亦朗朗上口,诗意盎然。由此可见,容闳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并不差。容闳1854年乘船归国到香港登陆时,一度讲汉语很困难。有些论者即以此为据认定容闳中文很糟糕。其实,对于一个十九岁才出国的青年来讲,即使在美国呆了七八年,肯定不会把母语忘掉。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自述的在香港的这种情况只是一时心急造成的,决不能以此就讲他留学回来不会讲中国话了。为了提高中文水平,容闳回国后曾在广州认真补习,大有长进。此后他在上海译书,在九江经商,在天津充当曾国藩的翻译,表明其中文运用自如。实事求是地讲,说容闳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未免过誉;说容闳中国文化水平很低,也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容闳具备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中美文化兼通,他的中文水平服务于其沟通中美文化的事业绰绰有余。

谈到容闳一生的理想,就是移植美国文化,让更多的中国人像他那样受到美国式的西方教育,从而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新路。他在1854年大学毕业前夕将自己的这种理想概括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0](P27)}在容闳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本的原因是缺少懂得现代文化的人才,如果能设法选派许多人到美国留学,现代人才培养出来了,中国自然就有救了。容闳的这种理想,显然不具备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没有抓住要害,但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则高人一筹。一般的译书、文艺演出、商贸往来、体育比赛、人员互访、科技交换、学术交流等,虽然也属于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但尚停留在具体行为方面,较少触及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更新。而留学生的派遣,则是要经历一个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消化以及返回国内后的传播、移植和创新,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容闳这种以人为本的中美文化交流模式,自然就从根本意义上实现了中美文化的沟通,同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时,曾想做一名医生,为解除中国人的病痛效力;还有人劝他去当传教士,传播上帝的“福音”;更有人希望他留在美国,过优越的生活。但容闳最后还是选择了归国致力于留学生的选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容闳的个人利益来看,他的这种选择风险颇大。他的好友吐依曲尔(Re. Joseph H. Twichell)牧师描述那时的

情况说:

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感情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中国人当中不可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阴郁险恶的前景。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10](P7-8)}。这种分析真实而符合实际。容闳留在美国,是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回到中国则充满荆棘和坎坷;要实现他留学教育的理想,就更茫然无知。然而,关怀中国富强的使命感,迫使容闳不能留在美国过幸福生活;让留学计划变为现实的强烈的事业心,催促容闳回到中国去奋斗拼搏。理想催生毅力,毅力强化理想。二者的相互搏动,让容闳主动承担起沟通中美文化的伟业。

三、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 奠定了中美文化沟通的根基

容闳从1854年归国具体实施其留学教育计划,到1872年中国首批留美幼童的派出,整整为之奋斗了十八年。其中的艰难和曲折,容闳在从耶鲁大学毕业时是肯定没有料到的。作为一个平头百姓,要说服清政府往美国选派留学生,几乎是痴人说梦。容闳归国后在广州、香港的碰壁,在上海的艰难岁月,在江西的痛苦经历,以及往太平天国寻求帮助等,表明他的理想与官府的需求相差甚远。在清朝那种官僚主导一切的社会里,任何个人理想如果得不到官员的认可是绝对难以成为现实的。容闳还是在结识曾国藩后,利用1870年办理天津教案充当翻译的有利时机,通过办洋务而走红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才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送给了曾国藩和李鸿章。曾、李二人急于解决办洋务的人才紧缺难题,才请求清政府批准,往美国派遣留学生。容闳留学教育计划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其个人理想和清政府对新型人才渴求相结合的必然结果。这种结合的原动力,则是容闳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从中美文化沟通的角度来看,留美学生的派出意义重大,诸如:

1. 从低层次的物的沟通提升到了高层次的人的沟通。所谓人的沟通就是通过派留学生相互研究对方的文化和社会,这自然将表层的文化交往深入到了人的文化修养和价值观的更新,更富前瞻性和挑战性。在留美幼童起航之前,中美之间也有贸易乃至图书等文化交流。例如,1867年春,美国国会向中国提供了五十份官方文件,作为政府资料交换。1868年,美国向清廷赠送了豆类、蔬菜以及各种谷物的种子,并要求清政府交换。此后,美国政府又希望中国提供税收、户籍、人口等方面的资料。1869年,清政府即回赠美国花种五十种、五谷和蔬菜子十六种,中国书籍十种九百三十四卷,包括儒家经典、医药科技和文化典籍三大类。这种交流比起派人到美国学习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就差之远矣。因为,只有出现了文化交流的人才,才可能使文化交流持之以恒,并发展到更高层次。

2. 开启了百年以来的留学潮。留学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容闳的留美幼童派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于1881年中途夭折,但出国留学的航船是由此起动的。由于它触及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才培养与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重大课题,所以负笈海外的留学生络绎不绝。20世纪初的留学潮,五四时期及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热,都是容闳开创的留学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即使是80年代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追根溯源,也不能忘记容闳的开拓之功。

3. 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结构和知识体系的更新。留美幼童的派遣向国人昭示,除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之外,还有新的更重要的学问;除了孔夫子的书外,更应该去读洋人的书。留美幼童之后,通过留学生,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介绍到中国大量的新文化,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知识分子的认知系统及文化构成也完全不是传统的那一套了。所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渗透着容闳留学教育计划的影子。

总之,容闳留学教育计划的实施,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美文化的沟通。也是有鉴于此,1876年其母校

耶鲁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在答词中称:

耶鲁校董会为表扬我而颁赠学位,乃是无比荣誉,远超过我个人的成就。作为一个耶鲁子弟,我永不会忘却拥有此项荣誉而负有的要求与义务。我个人接受它,谨系代表中国及中国人接受它。我个人视为是一项对中国的鼓励,视为是一项国家荣誉,是由世界上最年轻而进步的国家,颁赠给最古老而保守的人民,它鼓励中国走向世界,并学习西方的文学、科学及宗教。特谨向董事会再致谢忱^[11](P332-333)]!

在这里,容闳一是将此殊荣视为国家荣誉,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显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二是继续呼吁中国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抒发了以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的一贯志向。容闳通过向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习来达到民族振兴的思想在这里进一步发扬光大,而且终生未变。从百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演变来看,容闳的这种思想文化主张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极为珍贵。

[参考文献]

- [1]李喜所.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 [2]李定一. 中美早期外交史[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 [3]李喜所.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4]魏源. 海国图志[M]. 清光绪二年(1876)甘肃刻本.
- [5]林则徐. 四洲志[A].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篇[Z].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上海刻本.
- [6]徐继畲. 瀛寰志略[M].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福州刻本.
-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Z].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 [8]筹办夷务始末[Z].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9]章开沅.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J]. 浙江社会科学,1999(1).
- [10]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11]刘中国,黄晓东. 容闳传[M].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Rong Hong and the Sino-US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LI Xi - suo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Before 1872 when Rong Hong brought Chinese children to study in America, persons of lofty ideals made their efforts to communicate with America, but there was no much effect. Rong Hong made it possible for China and America to communicate each other. In addition, the levels of culture exchanges were raised consequently. The reasons why Rong Hong took this great responsibility were that he was rich with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ideals and enterprise.

Key Words: Rong Hong;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